



0022819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赵树理

ZHAO SHU LI

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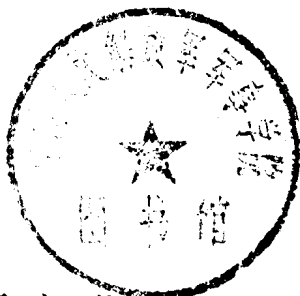


2 033 5165 7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赵树理代表作

蔺羨璧 刘景春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赵树理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85 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860册

统一书号: 10385·67 定价2.90元



作者(右起第三人)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作者手书毛主席词《咏梅》

一九七〇年，赵树理同志正遭受迫害的时候，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咏梅》这首词，嘱咐他的女儿赵广建送到周扬同志手中。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62-6/13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

赵树理一九〇六年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上过私塾，放过牛，背过炭，并喜欢民间音乐和地方戏。父亲看他有出息，宁愿借债，也要供他上学。一九二五年进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这对他成为人民的作家关系极大。在那里他接触了进步同学并广泛阅读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易卜生、屠格涅夫等的作品和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的论著，接受了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共产党。后因闹学潮，逃亡流浪被捕。他的处女作《白马的故事》、《悔》，就是一九二九年在国民党的“自新院”写的。一九三〇年出狱后，他再度漂泊、流浪，尝遍了人世甘苦。由于对旧社会的强烈愤激，一九三〇年他便以“野小”的笔名发表了《打卦歌》，通过“憔悴游人”揭露军阀混战造成的民不聊生；翌年又写了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揭露地主对放牛娃的压迫剥削。其时他在艺术上还很不成熟。《白马的故事》和《悔》有欧化倾向，《打卦歌》是古体诗，《铁牛的复职》是“旧瓶装新酒”。

赵树理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从那时起他就立志搞“文摊

文学”。因为“他感到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把自己的作品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从而夺取“封建文化阵地”。（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种社会观和文学观转变的创作实践，就是他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盘龙峪》（现在仅存第一章及“忧心的日子”和“过差”两个片断）。据作者说，这部小说是“描写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故事”，语言基本是口语化的。这是他摆脱学生腔和欧化倾向，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一次认真试笔。

时代造就作家。一九三七年赵树理适应抗日救国形势的需要，参加了革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进一步认识到文艺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他先后主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人民报》和《中国人》等三种报纸的副刊。他说：“在这三次办报过程中，也写了几十万字的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中心主题是宣扬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抗日。一九四一年他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专门写通俗读物。他用大众化的形式，创作了严惩汉奸走狗的剧本《万象楼》。

如果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二年是赵树理追求民族化、大众化的摸索、探求阶段；那么，从一九四三年的《小二黑结婚》到一九四九年的《田寡妇看瓜》则是他追求民族化、大众化走向稳定的成熟阶段。彭德怀同志给《小二黑结婚》题词写道：“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出版后，轰动了解放区，这表明新文学真正深入到农民中间去了。就是这年的秋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了太行区，赵树理特别高兴，说毛主席批准了他的创作方向。于是，他的创作热情更高，接着又写了中篇《李有才板话》、长篇《李家庄的变迁》。鉴于赵树理创作上的这种飞跃，一九四六年周扬、郭沫

若、茅盾等先后撰文，给予赵树理以高度的评价。周扬称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郭沫若说：“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也就象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株大树子。”（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茅盾说，《李家庄的变迁》“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这样，赵树理就成为解放区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一面旗帜。这一时期赵树理集中写小说，这是他创作生涯中最顺利、最多产的六年。

一九四九年，赵树理随《大众报》进入了北京，不久被选为中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剧协委员和中华曲艺改进会的副主席，并主持编辑《新曲艺》、《大众文艺》、《说说唱唱》，继续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从《登记》到《十里店》，他的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热情拥抱生活到深沉思考的过程。其间他写有小说、戏剧、散文、快板诗和文艺评论。《登记》打出了当代文学反对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第一枪。写了《登记》之后，赵树理便重返晋东南，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又和他熟悉的太行农民“共事”，在一九五四年完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优秀长篇《三里湾》。它是赵树理长篇创作中的艺术高峰。《登记》、《三里湾》都热情歌颂了新的生活和新的 人物，反映了开国盛世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三里湾》出版之后，赵树理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他的老战友王中青说：“有位熟知赵树理同志为人的领导同志对我说，赵树理在农业初级合作化时期是积极的，热情的，卖命的；高级化时期他就好提意见了；人民公社化时期，他老是沉默寡言了，就认真地向中央提出他

的建议——‘万言书’了。”（王中青、李文儒：《记赵树理的最后五年》）他自己也曾说：“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正产生于此时，而且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不相适应”，实际是赵树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越来越厉害的极“左”干扰相矛盾的具体反映。他不适应的是国家对集体生产管得太严，是“大跃进”、刮“五风”，是创作上的清规戒律。他深沉地思考着。他凭着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处境的真切感受，深入体察，继续写他的“问题小说”。所不同的是，《三里湾》以前写的是和此时此地工作步调相一致的“问题小说”，如今写的却是和“左”倾干扰不相适应的“问题小说”。这一时期，从小说创作看，他主要写短篇，大半是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如《锻炼锻炼》、《老定额》、《互作鉴定》、《卖烟叶》等。《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是赵树理作品中罕见的颂歌。《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是他后期现实主义深化的代表作。

在众多作家盲目歌颂“大跃进”的热潮中，赵树理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写出了《锻炼锻炼》。他批评农村干部的和事佬思想，提出了在改变了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培养、提拔青年干部和教育农民的重要问题，并且以争先社的不景气揭示了“大跃进”的缺乏群众基础。就是这样的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却被指责为“歪曲”和“丑化”农民。《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又是通过歌颂正面人物抵制大跃进的浮夸风的。《套不住的手》是以“大跃进”为背景的。“大跃进”是“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年逾古稀的陈秉正却不尚浮夸，只知用勤劳的一双手实干，正好和“大跃进”的那种空洞的豪言壮语震天响的时代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干家潘永福》意在为干

部树立新风，它极力突出潘永福的以身作则，苦干实干及其“经营之才”，并且评点说：“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实’利，最要不得的作风就是只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这是点睛之笔。所以，侯金镜说：“作者所以为潘永福同志立传，是有所感而发，有很明确很强的现实目的。”（《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222页）

在周总理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推动下，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在发言中指出：“会上对赵树理同志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他的创作估计不足，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康濯也说：“我在这里只想强调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赵树理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就是在这个会上，赵树理被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和“圣手”的。这是他生前听到的对他后期小说所作的公正的评价。然而，好景不长，紧接着在一九六四年的批“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斗争中，又把赵树理作为写“中间人物”的典型代表，加以声讨，说他“近几年来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切不公正的批评，早已被历史所审判。

但这样说，是不是赵树理的作品就没有缺点了呢？当然不是。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赵作，他后期的某些篇什，也留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作者思想的局限。

赵树理是以写小说著名的，但他却一直没有忘记写戏。这是因为他觉得“现在我国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也太繁忙，

一本一本地看小说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能看，这有多好。”（岷垠：《“让老老少少都能看”》）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和改编的剧本主要有《开渠》、《三关排宴》、《十里店》等。

《十里店》是根据他一九六四年下乡参加“四清”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它揭露了大队长刘宏建欺上瞒下弄权营私的恶劣作风；尤其是在塑造新人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代表社会主义势力的马红英、王家骏等在赵树理笔下的新人形象中是较为丰满的。但从整体看，这个剧本却反映了较明显的时代弱点。

赵树理是喜剧作家，到头来却落得个悲剧结局。他生前还计划写《户》、《石头底》、《灵泉洞》的续篇。然而在“文革”中却被加上“老右倾”、“三反分子”、“黑作家”、“贫下中农的死敌”、“大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最终未能实现宏愿，在一九七〇年被迫害致死。

二

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作品时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赵树理虽然不能和托尔斯泰相比，但他的作品，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深刻反映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本质。

我们的国家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有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强大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毒害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反封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赵树理最

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最关心农民的命运。他搞“文摊文学”，就是为了夺取农村的封建文化阵地。他写“问题小说”，就是要解决象《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锻炼锻炼》所提出的那一类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的农村，在土改之前，地主阶级占着统治地位，一切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或是由地主阶级安排的，或是受地主阶级思想支配的，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思想，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思想敏锐的人们即使感到不合理，也往往是无可奈何的。”

（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他也没有放弃反封建的任务。他说：“农村反封建是一个长期任务，不要以为进入社会主义了，就小看这个问题。”（黄修己：《做局中人》）这样，反封建就成为他创作的中心主题，也就构成了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赵树理的创作又显示出不同的反封建色彩。土地改革前，他反映的是以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势力为主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社会现实。《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刘二和王继圣》、《邪不压正》等都是。这些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及其伦理道德给中国革命和农民的思想意识造成的严重危害。《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恶霸地主李如珍，在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时，演出了“血染龙王庙”的惨剧；后来又投降日寇，当了汗奸，成为李家庄适应国民党反革命和日寇侵华需要的，破坏民族解放战争的罪魁祸首。《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把持了村政权，破坏减租减息，使阎家山的民主政权名存实亡。《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和兴旺混进村政权，破坏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婚姻，使民

主政府的婚姻政策不能贯彻。赵树理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他们的反革命丑恶嘴脸，揭示了封建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头号敌人。由于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一些农村干部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感染。为了使干部有所趋避，赵树理还写了陈小元（《李有才板话》）的变坏和小昌（《邪不压正》）的弄权营私。他们的蜕化启迪我们：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下，如不彻底根除封建思想的影响，也容易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封建主义的专政。与此同时，赵树理还为那些效忠封建权势的奴才画了像，如《邪不压正》中的小旦，地主刘锡元当政时，他为刘锡元的儿子向软英逼婚；八路军来了，小昌当了农会主任，他又摇身一变，为小昌的儿子向软英逼婚。小旦之流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起到封建地主和蜕化了的干部起不到的恶劣作用。赵树理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把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向更深层次推进了一步。

为了彻底根除封建势力及其思想意识的影响，赵树理还抱着砭其痼疾，促其猛醒的态度，以剖析封建旧式家庭为轴心，对千百万农民身上的那种封建的习惯势力，进行了深刻批判。通过老秦（《李有才板话》）、杨老太爷（《杨老太爷》）对小福、铁蛋的人身占有，批判了老子对儿子的那种绝对统治的危害。通过梅妮娘、梅妮（《孟祥英翻身》）对孟祥英的歧视、虐待，批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的罪恶的婚姻制度。通过三仙姑对待于福的不平等，从另一角度批判了封建买卖婚姻、封建思想意识对正常家庭关系的破坏。

可见，在民主革命时期，不管反映敌我矛盾还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赵树理都是把反封建作为攻击的总目标的。土地改革后，随着革命的深入，赵树理的笔触又集中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上，而矛盾的焦点又是集中在农村的封建残余思想与党的新政策、与社会主义道路不相适应上。从一九五〇年的《登记》到一九六四年的《十里店》，这个主题是贯彻始终的。《登记》中燕燕的母亲和媒婆五婶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民事主任搞弄权营私，王助理员搞官僚主义，都是扼杀自由婚姻，与党的新婚姻法相背谬的。《三里湾》中马多寿念“糊涂经”，搞封建家长制统治，目的是为了对抗走农业合作化道路。《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依仗和社主任王聚海的宗族关系，有恃无恐地破坏集体管理生产。《十里店》中的大队长刘宏建搞封建联姻，独断专行，弄权营私，败坏党风，败坏社会风气，直把十里店搞得乌烟瘴气。赵树理说他写《三里湾》是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然而小说的实际表现，却仍然是揭露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对发展集体生产的危害。这是赵树理现实主义的胜利。

赵树理横跨两个历史时期的创作，不但揭露了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家庭的罪恶，而且还揭露了这种道德观念利用家庭的束缚造成的世代相传的可怕性。当年梅妮打孟祥英是他娘挑拨的，如今张木匠用小锯梁打小飞蛾，也是他母亲给出的主意；袁小俊和王玉生的离散，也是“能不够”从中调教的结果；当年三仙姑把于福当奴隶对待，如今“能不够”也任意摆布袁天成，“吃不饱”同样虐待张信。总之，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世代相传的长期性都是以旧式家庭为轴心的。赵树理揭露了这种可怕现实，就是为了提醒社会，通过改造旧家庭有效地切断那种世代相传的渠道，彻底挖掉滋生封建残余的土壤，为革命、为社会进步扫清道路。

建国后的十七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一股劲地鼓吹

“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不少作家都忽略了反封建这个“老问题”，而赵树理却仍然坚持从“老问题”突破，解决“新矛盾”。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改造旧式农民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提出了改造旧式家庭的问题。这种现实主义的深化，表现了赵树理反封建的卓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

与反封建相联系的，赵树理在新文学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塑造了新式农民的形象。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毒害，就有反压迫、反毒害力量的生长。赵树理忠实于生活的这种辩证法，在揭露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和旧式农民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制思想意识的同时，还热情歌颂了新式农民的反封建精神。

二十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写了被污辱、被损害的农民；三十年代，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叶紫的《丰收》等写了初步觉醒的农民；四十年代，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则别开生面。正如周扬同志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写了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作者虽然没有创造出高度集中的典型，象阿Q那样的，但他无论如何写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这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以前所未有的意识到的民主思想，强烈追求翻身解放，就构成民主革命时期赵树理笔下新式农民的鲜明标志之一。

列宁在谈到如何提高工人的阶级政治觉悟时写道：“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同工人同工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怎么办？》）提高工人的阶级政治觉悟需要灌输，提高农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也需要灌输。铁锁和孟祥英的成长，反映了赵树理笔下的新